

中国“膜”法迈向全球:通利集团的破局之路

左振乾

在经济活跃的长江三角洲版图上,江苏江阴以其强大的民营经济基础和众多“隐形冠军”而闻名。在这片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沃土上,在地方政府“澄心办·办澄事”一流营商环境的滋养下,一家专注于功能性新材料的企业——江苏通利光学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通利集团”),正以其惊人的创新速度和扩张步伐,悄然崛起为中国功能涂层复合材料行业的头部领军企业。

“小薄膜”做出“大文章”,技术创新铸就护城河

功能涂层复合材料,虽不为大众所熟知,却是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、新能源汽车、半导体封装等高端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。从让屏幕更清晰透亮的光学膜,到让锂电池更安全的绝缘膜,再到汽车上的防紫外线窗膜……通利集团所做的,正是为这些基础材料注入科技的“灵魂”,让薄膜“活”起来,拥有各种前所未有的功能。

走进通利集团的研发中心,一派繁忙却有序的景象扑面而来。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周永南强调:“这个行业,没有研发投入就没有未来。我们始终坚信,技术壁垒是



生产车间

企业最深的护城河。”Frost & Sullivan(弗若斯特沙利文)独立行业研究报告显示,中国功能涂层复合材料行业正朝着高端化、精密化快速迭代,下游需求呈爆发式增长,持续推动技术革新。

通利集团正是这一趋势的先行者。集团年报显示,其研发投入常年保持在营收的6%以上,研发团队占比超12%。截至目前,集团已拥有授权专利500余项,其中发明专利近百项,多项产品被列入“国家火炬计划”并获评“高新技术产品”。通利集团旗下通利光电和智慧新材均成功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,这无疑是对其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。

从江阴到连云港:产能布局背后的远大棋局

如果说技术创新是通利集团持续发展的“引擎”,产能扩张则是其驰骋广阔天地的“车轮”。

除江阴市长泾镇的总部基地

外,通利集团在连云港新建的生产基地已顺利投产。这一布局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产能瓶颈,更是集团整合资源、嵌入全球供应链、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落子。

周永南坦言:“布局连云港,不仅是成本考量,更是基于对未来市场需求的战略预判。”据预测,全球功能涂层复合材料市场规模将从2023年的近1.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8年的近1.9万亿元,中国市场增速更为显著。通利集团必须提前卡位,才能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。

产能释放直接助推市场地位跃升。根据Frost & Sullivan的报告,按2023年收入计算,通利集团已位列中国功能涂层复合材料市场国内企业第一位,整体市场第六位,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龙头。

突破融资困局,民企呼唤更多金融活水

然而,通利集团的发展并非

一路坦途。与众多民营企业一样,它也面临诸多困难,尤其在资金、土地、数据等关键要素获取上仍处劣势。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如同悬在民营企业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,制约其扩大再生产与创新投入能力。

周永南也坦承了企业成长中的现实困境:“制造企业前期设备投入巨大,流动资金需求高。即便已是行业龙头,但在发展过程中,依然会遇到传统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‘不敢贷、不愿贷’的情况。”

通利集团的破局,一方面依赖于自身的扎实业绩与良好信用,逐步赢得资本市场信任;另一方面,也得益于江阴当地政府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,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。但周永南也呼吁,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,拓宽融资渠道,让更多像通利集团一样有技术、有市场的民营企业“跑得更稳、更远”。

未来已来:从材料供应商到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者

展望未来,通利集团的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。

周永南描绘了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:“我们不再满足于做一两个‘单品冠军’,而是要成为像

3M、日东那样的世界级‘平台型’企业——从单一材料供应商,转型为‘材料+设计+解决方案’的一站式服务提供者。”

这一战略正与行业发展趋势高度契合。报告指出,行业内正涌现“解决方案设计者和提供者”,领先企业正在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,共同开发创新材料。

通利集团积极围绕物联网、智能城市、消费电子、柔性显示、新能源汽车等黄金赛道,持续开发各类功能性新材料。目前,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三星、华为、松下、LG、BYD、吉利、奇瑞、仁宝等全球知名品牌的供应链体系。

【调研手记】

在通利集团身上,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经济的韧性、智慧与勇气。它扎根江阴、放眼全球,聚焦实业、坚守创新,以“破局”之志不断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,以战略眼光实现产能与市场的双扩张。

尽管前路仍有风浪,但以其为代表的一批专注主业、勇于创新的中国制造企业,正坚定地“从中国制造”迈向“中国创造”,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坚力量。他们的成长历程,正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与生动注脚。

(上接第五版)

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、高调的“社会美妙”理论,而是实在的、大家都有活路的“社会共生”理论:穷人不能再穷,富人不必“出走”,中产必须扩大,社会各界都有奔头。其中,扩大中产群体,是“社会共生”的中心环节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,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估计只占总人口的25%—30%,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,刻不容缓。社会改革,应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。

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。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,已接近“社会容忍红线”。要做到大家都有活路,必须缩小贫富差距,远离“社会容忍红线”。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萨尔“就分配谈分配的窄圈”,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“体制瓶颈”,特别要正视产权制度和政府制度问题: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,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;由分配机制转型切入,向政府制度转型提升。

经济改革的五个重点

经济改革围绕“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”改革,突出五个重点:

(1)垄断行业改革。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(如电网、铁路网、航空网、骨干电讯网等),可暂时不破垄,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“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”;而对过时的、假冒的所谓“自然垄断”,以及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(如发电、铁路运输、航空运输、电讯运营业务等),要坚决破垄。对法令性的垄断(如烟草),可不破垄;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(指利用行政权力保持不合理垄断地

多元阶层欲共生,需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“安全网”。在“安全网”能兜住的情况下,再着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。

中国的改革开放“是一场深刻的革命”,同时又是“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”。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体框架,需在“一场深刻的革命”与“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”之间作文章。如果把改革目前达到的水平视为“地平线”,把基本的“红线”比作“天花板”,那么两“线”之间改革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。

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“边际演进”的渐进式改革之路,经过30余年,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,余下的都是“坚硬的堡垒”。在改革的“战车”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,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“堡垒”面前。改到此时、此处,需要突出重点、啃硬骨头,应当制定并实施紧迫的、有重点的、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。

位的),要坚决破垄。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,不应破垄,还应进一步加强,以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;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(如厂商串谋、寡头垄断以及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行为等),应坚决破垄。在此,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“产业集中”等同于“垄断”的误区,化解以“提高国际竞争力”为由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“心结”。

(2)农村土地制度改革。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,尊重农民对承

包土地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置(包括流转和抵押)权利。其一,建议调整“赋予农民权利”的提法,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“恩赐”色彩。从产权关系来看,农民的土地既不是“国资”,也不是“党产”,何来“赋予”之说?实际上,“农民的权利”是“天赋”的,建议采用“承认”“尊重”“保障”的表述。其二,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流转,使农民最大程度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。其三,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,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,对这一权利予以确认。

社会改革的五个重点

社会改革围绕“社会共生”和社会组织创新,突出五个重点:一是收入分配改革;二是户籍制度改革;三是事业单位改革;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;五是社会组织改革(如各种社团组织,重点是“去行政化”、实行登记制、取消主管部门、经费自筹等)。

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,特别需要一代“喜欢变革、喜欢破除传统事物”的新人。如果说他们属于“异类”,那么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“异类”。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“超限制新人”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。

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,会遇到一些障碍,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。笔者在问卷调查中发现,56%的受访者完全赞同“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”这一提法,这一结果值得重视。这就产生了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也不能

(3)金融体制改革。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,推动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;同时推进利率、汇率市场化改革;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。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把握两个抓手:存款保险制度和SHIBOR(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)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。

(4)财税体制改革。重点改革分税制和预算管理体制,开征房产税、遗产税、环境税等,以及改革资源税等。

(5)资源性产权价格为重点的价格改革。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,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。

够用传统的“你死我活”思维应对,而应该采取“差别化”对策。其中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“障碍力量”的束缚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,其利益已受到较大削弱,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,其影响力依然较大,在新条件下可能以新形式显现。同时,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。其中的一小部分人,既不希望倒退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,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,极力维持目前某种“胶着”状态的局面,期望从这种“未完成的改革”状态中获利。新、老两种情况交叉并存,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,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。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,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,是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。

(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;本文来源:中国改革网)